

群体性事件爆发机制与舆论监督时机选择

——基于核物理理论的一种对比分析

廖卫民

摘要：针对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基于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理论，本研究以集体行动为观察对象，通过借鉴比较核物理中的核裂变和核聚变的理论分析，探究群体性事件的一般爆发机制，并建构了一个过程演化模型。研究发现，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核反应过程与群体性事件过程实际上具有某种相互对应的、类似的作用机制；从群体性事件连续统的低能级区域跃升至高能级区域，一般要经过反复的抗争互动和力量较量，至少要经过两次引爆过程。在群体性事件从酝酿到爆发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舆论监督发挥着信息解惑、情绪解气、行动减压、政策纠偏的功能。对群体性爆发机制的学理分析，有助于选择恰切的舆论监督时机，有助于全面理解和综合应对中国当下转型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舆论监督；爆发机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核物理理论

作者简介：廖卫民，男，讲师，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5-0001-08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考察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发现事件往往风起于青萍之末，起初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一定条件下就酿成轩然大波。在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舆论监督的缺位、迟到或早退都对群体性事件进程的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舆论监督事实上是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解决潜在社会矛盾和问题，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着力探索的问题是：群体性事件爆发有什么内在机制？在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舆论监督时机选择对事件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连续统的理论假设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一个当今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近期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题名中含“群体性事件”的文献有358篇，而“公安”类目下就有183篇，占去一半以上，其次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类目下有43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有25篇，“社会学及统计学”有19篇，“新闻与传媒”有19篇。大量的研究文献关注到这一问题，只是在不同学科视角的观照下，对群体性事件的解读和分析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

本研究采纳于建嵘给出的一个简洁的概念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1]由于其概念边界较为宽松，因此，它包括各类日常的集体

行动事件、持续性的维权行为、突发性的集体泄愤事件、带有严重暴力冲突的社会骚乱以及其他极端性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在本研究中,首先假设其概念范畴内包括从小到大、从温和到暴力、从局部到整体性、从日常到突发的全部集合的群体性事件,其蕴含的社会动能如果可以精确测量的话,则在数量上应该是一个连续统^①。以中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例,大量的日常性群体上访、请愿、维权等集体行动,渐次包括较少数量的游行示威、静坐、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多种方式的集体行动,以及极少数的社会骚乱和极端性的群体暴力事件、社会暴动。

三、群体性事件爆发机制的一个理论解释——比照核物理理论的分析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尽管有非常多的文献对群体性事件做了多方面、多视角的研究,但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爆发机制的微观刻画和准确描述上,依然不够清晰。为此,本研究将借助西方的社会与政治运动研究的相关理论,在有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比照核物理学关于核裂变和核聚变现象进行理论模型建构和分析。

(一) 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一种解释模型与核反应原理的对比分析

刘能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对中国集体行动进行了理论解释^[2],笔者以为与核反应模型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异曲同工。一个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用P指代)与“怨恨的生产和解释”(用G指代)、“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用A指代)、“参与者的成本-收益计算”(用C指代)密切相关,因而构成一个数学函数:

$$F(P) = f(G, A, C) \quad (1)$$

刘能虽然探讨的是中国都市情境下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更广大范围,其相关分析大致可以概括为:第一,不仅怨恨生产的场域在不断扩大,而且其频率也在加快。第二,怨恨所指向的目标(是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政治主体,还是非政治主体)之不同,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而权力机构的不同回应,则既可能降低原始的怨恨水平,也有可能激化或提升其水平,从而导致怨恨的再生产。第三,“怨恨的解释”作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可以分为:“对原生怨恨的认知和标定”和“对次生怨恨的认知和标定”;从中国的经验看,次生怨恨比原生怨恨更容易激发参与者的行动。

由此可见,在这个模式中,“怨恨”或者按照斯梅尔塞(Smelser)所称的“结构性的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structural strain)^[3]是中国社会中激发集体行动的一个能动性力量,而怨恨本身是具有感染能力的,也就是说具有信息传递兼能量传递的特质。因此,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在本研究中就可以从理论上把“怨恨的生产和解释”看成或假定成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能量中介,就有可能比照核物理中的核子反应模式进行分析,即“怨恨的生产和解释”就类同核反应中的“中子”。那么,“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则大致相当于原子核的特性(即是否有易于裂变和聚变的特征);“参与者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变量,大致相当于核反应前后能量消耗与释放之间的净能量。这样,上述公式(1)就与后面列举的核反应化学方程式(2)具有一种对应性,即如果公式(1)中所指涉的集体行动发生了,那么,其发生过程就类同(2)揭示出的要素转换、相互作用的实质。

根据以上分析,在理论上应存在有助于降低群体性事件这类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舆论引导行为,包括舆论监督行为。舆论监督在客观上有助于消解“怨恨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具有预防群体性

① 连续统原是一个数学概念,例如,在实数集里实数可以连续变动,也就可以说实数集是个连续统。用自然语言进行解释:连续统意味着在数量上可以连续变动;在连续统的假设下,才可以进行某些数学运算,某些函数表达式才有意义。在这里借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后面理论推导论证上的逻辑严密性,连续统假设是后面的数学公式运用的前提。

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

（二）群体性事件诱发机制——一种链式裂变反应模式

根据以上理论模式推演的铺垫，本研究在核反应机制与集体行动机制之间建立了一种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尽管不能说核反应方式就一定与人类集群行为方式具有某种同构性，但至少在本研究中可以尝试借用已经能够非常精确刻画的核物理理论来启迪思维，解释或揭示人类集体行动现象背后的一种可能具备“自然性”的规律或关系。

首先，借用一下目前来看非常成熟的核裂变理论知识。根据著名核物理学专家王淦昌的介绍，20 世纪 30 年代末，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用中子轰击铀 - 235 原子核，它会分裂成两块碎片，这就是原子核的裂变。在裂变过程中，会放出 2—3 个中子并伴随能量释放，一个铀 - 235 核裂变时约释放出 200MeV 的能量^[4]。其中的一种核裂变反应可以表示为：



由该反应式可见，其左侧是一个中子，右侧变成 2 个中子，这一反应新生出的中子又会引起附件的其他核反应，放出第二代中子，就这样不断进行下去形成自持的“链式反应”，若不加以控制，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形成核爆炸。原子弹就是利用此原理研制出来的。

这样就可以比照群体性事件中的诱发机制：即对于一个具备潜在的组织能力和裂变危险的群体，一个小小“中子”的第一下轰击，就可能引爆一连串的链式反应，使得群体内成员集聚的社会动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这个“中子”，可以类比为“怨恨”，而且是“原生怨恨”，它可能是出于对切身利益受损而不满（例如：汉源事件中移民经济利益受损），也可能是个体或群体遭受苦难体验（例如：万州事件中当事人被打，东阳事件中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或感官不适等），还可能是对社会问题的忧虑和社会不公的义愤（例如：厦门 PX 事件中的预期环境影响）。

（三）群体性事件爆发机制——一种热核聚变反应模式

根据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2000）介绍，核能释放的另一种形式是核聚变，即由两个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的核反应过程。聚变反应会放出比裂变反应更大的能量。例如，著名的氘（D）和氚（T）之间的核聚变反应过程：



在这一核反应中，每个核子释放的能量平均值差不多是核反应（2）式每个核子释放能量的平均值的 4 倍。然而，要使核聚变发生，就需要点燃聚变反应，这与生炉子的道理是相同的，不过，核聚变发生的点火条件非常苛刻，同时极难控制^①：要求温度极高，在上千万度以上；核燃料等离子体要求密度极大^②。这样的核聚变反应实际上是一种热核反应。1952 年，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证明了地球上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热核聚变能释放，其原理就是用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高温，引发氢弹爆炸。

在核能技术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经常探讨的一种球形内爆惯性约束聚变，对思考群体性事件爆发机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一方法简言之，就是把几毫克的氘和氚的混合气体装入直径约几毫米的小球内，然后从外面均匀射入激光束或粒子束，球面内层因而向内挤压。球内等离子体受到挤压，压力升高，温度也急剧升高，当温度达到需要的点火温度时，就发生核聚变爆炸，产生大量热能。这样的爆炸每秒钟发生若干次，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比照群体性事件，其爆发暴力冲突和骚乱、暴动等极端行为的过程，实际上同样存在着与核聚变爆

① 目前的核能利用技术在核聚变领域还主要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关键原因在于核聚变难以控制，后文所探讨的“惯性约束聚变过程”也主要是理论推演，并没有实现核能的开发利用。
② 根据理论推导，得到著名的劳逊判据，做进一步计算，可以得到具体的核聚变反应的温度和等离子密度的数据。

发机制相通的必要过程：一是集体行动参与者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聚集；二是行动者必然受到相当强度的暴力挤压，或者受到可以被视为挑衅行为的激怒；三是行动者受压后的情绪高涨及相互之间进行激发感染；四是行动者一致向外寻求能量突破口，攻击外围目标和行动障碍物^①；五是行动者的暴力行为持续进行，当内心积聚的“怨恨”动能释放后，其行为才会有所收敛；六是行动者的群体行为形成后果，极有可能造成某种毁灭性的社会伤害和破坏，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需要指出的是，到达类似“核聚变”状态的群体性事件，在其连续统中往往都是位于极端性的边界，在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中也属于较罕见的情形，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也基本属于后期阶段。

综合以上讨论，本研究将核反应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比照分析归纳成一张表进行梳理和概括。这样，表面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核反应过程与群体性事件过程，经过仔细比照，竟然具有某种相互对应的类似的作用机制。

表 1 核反应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比照分析归纳表

比较	核 反 应 过 程	群 体 性 事 件
发生条件与可能性	一、核裂变反应的条件与可能性	一、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
	1. 具有较高能量的中子	1. 怨恨的生产和解释
	最初轰击的第一代快中子	原生怨恨（因原发事件产生的）
	链式反应后的第二代中子	次生怨恨（历史积怨、借题发挥）
	中子轰击的方向、目标及部位	怨恨的解释（指明集体行动的方向与必要性）
	2. 易于裂变或聚变的物理特征	2. 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
	3. 核反应前后能量消耗与释放	3. 参与者的成本－收益计算
	4. 核燃料的纯度或混合程度	4. 集体身份、认同感或群体的异质程度
控制与治理	二、核裂变反应堆控制手段	二、群体性事件治理对策
	1. 安全棒、控制棒（由吸收中子的材料做成）	1. 信息公开和官民沟通（消除怨恨产生的土壤）
	2. 慢化剂（减慢中子运动速度）	2. 有针对性的媒介报道、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
	3. 冷却水（吸收热量，转化能量，利用之）	3. 舆论监督，解决具体社会问题，转危为机
爆发机制与具体过程	三、球形内爆惯性约束聚变过程	三、极端性（暴力）的群体性事件爆发过程
	1. 氘和氚混合气体装入直径约几毫米的小球内	1. 集体行动参与者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聚集
	2. 外面均匀射入激光束或粒子束，球面内层因而向内挤压	2. 行动者必然受到相当强度的暴力挤压，或者受到可以被视为挑衅行为的激怒
	3. 球内等离子体受到挤压，压力升高，温度急剧升高	3. 行动者受压后情绪高涨及相互之间进行激发感染
	4. 温度达到需要的点火温度时，就发生核聚变，向外爆炸开去	4. 行动者一致向外寻求能量突破口，攻击外围目标和行动障碍物
	5. 爆炸每秒钟发生若干次，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5. 行动者的暴力行为持续进行，内心积聚的“怨恨”释放
	6. 产生大量热能，如果控制不当，将造成热核辐射危害	6. 行动者的群体行为形成后果，极有可能造成某种毁灭性的社会伤害和破坏

① 人类的集群行动可能会出现更复杂的情况，根据一些具体案例来看，在群体性事件中的骚乱泄愤行为和暴力攻击行为有些是有明确指向的，有的是无目的的，有的是夹带个人私利的报复。

四、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一般模型和两次引爆机制

（一）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和机制的一般模型

为了讨论的方便，先概括归纳出一个有关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和机制的一般模型，以便在研究细部问题前，先获得一个整体的轮廓印象。在综合了有关学者关于社会和政治运动^[5,6]、斗争政治^[7]、群体性事件^[8]、集体行动和集体暴力^[9]等的理论思考和前面相关论述，本研究勾画出了一张典型的包含集体暴力冲突生成的群体性事件演化逻辑图。

在图 1 中，从最左下角出发，受转型期的某种矛盾和问题困扰的个体行动者，从最初的正常解决渠道开始，不断进行沟通 and 抗争；一直发展到最终到右上角，极端性的或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的事态平息。箭头方向表明事态运行方向或信息传递方向，方框表示各种重要的参与主体（行动者、政府部门、防暴力量等），或者是行动的内容、方式、过程和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图的底部和左下部部分严格说还不属于群体性事件的内涵领域，而是一般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生成或化解的常规路线图，解决不了的社会矛盾往往是群体性事件酝酿的发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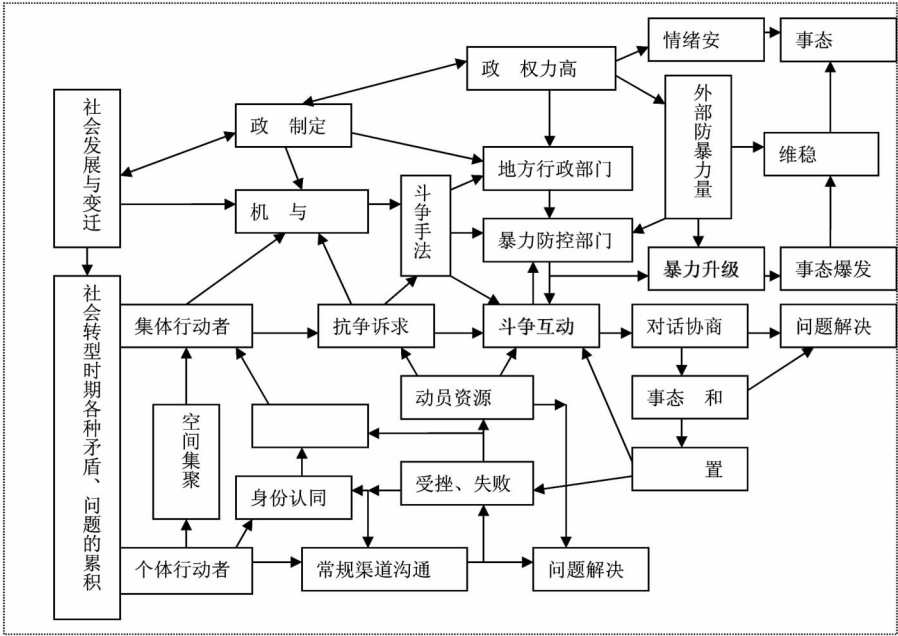


图 1 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和机制的一般模型示意图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两次引爆的诱发爆发机制

根据图 1 所示的一般模型图，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中真正的酝酿发生过程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过程往往是在这一模型图的中心位置，即集体行动者由抗争诉求出发，依靠资源动员，采取一定的斗争手法，与地方行政部门（或具体行政部门）和暴力防控或维稳部门（公安、武警等）的斗争互动。其中的“斗争互动”环节是引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环节，如果双方能够采取对话协商方式处理的，一般不会导向暴力冲突；如果集体行动者和其对立方采取逼迫性和对抗性的处置方式，则有可能产生核裂变的过程，这就构成了第一引爆。

第一引爆的方式何以主要表现为裂变方式呢？关键在于源发自我体性的诉求（“原生怨恨”），需要在裂变模式下激活各种“次生怨恨”，在“怨恨的解释”（一般是正当权益诉求遭到拒斥，集群群体感到明显不公，于其情于其理说不通，或者是身份认同被否定压制，有可能已经构成了一种现实性的结

构压力)作用下,启动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群体的规模,集聚了社会能量,往往使得群体中的个人之间产生情绪激荡,使之心生无畏,敢于赴汤蹈火,以暴对暴,最终形成对抗性的群体力量集结。

如果在这个时候,降低集群的空间集聚密度或进行有效的情绪疏导(正如裂变反应中的控制棒和安全棒的作用),会使得群体聚集的能量和热度保持稳定;但是,如果群体在空间的集聚加强,其行动的不确定性则明显提高,在谣言、偶发的暴力行为触发下,就可能引发“暴力升级”,形成类似热核聚变一样的事态,如同世界历史上陷入“群体狂热”^[10]的群氓暴民一样^①,骚乱和破坏社会秩序的集体暴力就此爆发已经在所难免了。这实际上构成了第二次引爆,如同原子弹引爆氢弹。

严格地说,当然还存在第三次引爆的可能:如果集聚能量足够大,则会导致其在地理区域上的迁移或时间空间上的扩散运动,引爆在第一次裂变中未来得及燃烧或未到达爆炸要求的更多“核燃料”,群体性事件就可能演化成为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

五、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的舆论监督功能及时机选择策略

其实,根据上述群体性事件演化逻辑图可以看出,舆论监督环节可以渗透在其中的任何环节。从涉及事件发展的时序来看,笔者认为讲究时机、运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至少可以发挥四种重要的功能:第一,信息解惑;第二,情绪解气;第三,行动减压;第四,政策纠偏。

(一) 群体性事件未成形时期——舆论监督的信息解惑功能

在群体性事件还根本未成形的时候,往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矛盾、问题,并逐步累积,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把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消弭于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重要的政策信息,了解广大民众的内心诉求,让各级政府官员、社会组织机构的管理者、学者专家等有机会与民众通过媒介的桥梁进行深入对话、交流、沟通,可以有针对性地探讨一些潜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在一项水库移民拆迁方案出台之前,新闻媒体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信息披露,质证整个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提出可能面临的问题,修正、校正原有方案的错漏,甚至改变或推翻整体错误或不可行的方案。在这一时期,舆论监督介入得越详尽越到位,往往就可以把重大的社会风险控制在安全平静的社会氛围中,发挥其“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群众的参与热情积极利用起来,不仅解决了社会问题,还能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作用。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披露,则会导致谣言、民谣、社会腹诽不断风生水起;如果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特别是让广大民众能参与到政策制定、社会管理事务的具体环节中,让新闻媒介能充分监督政策实施,则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能从根本上消除群体性事件的生成。

(二) 群体性事件充分酝酿时期——舆论监督的情绪解气功能

在群体性事件前期酝酿的时候,个体行动者在合法维权努力失败,或者在个人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的时候,往往会动员各种资源进行抗争,也可能通过空间集聚和身份认同过程转化为集体行动者,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情绪性的舆论,酝酿着群体性抗争行动。在这个时期,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则起到了情绪解气的作用,即通过报道新闻事实,让矛盾的双方能有机会进行沟通,甚至互相“诉苦”,进行换位思考,从而在媒介上呈现社会矛盾多侧面多层次的利益诉求点和不满情绪,在对能形成集体行动的议题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和不同的诉求交锋后,一些集聚郁积的愤恨情绪可以在一定

^① 在世界历史上,人类陷入群体狂热之中,往往做出群体非理性的行为,成为失去控制的群氓暴民。这在罗伯特·门斯切的《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书中有大量的案例介绍和观点解释。

程度上宣泄出去，消散开来。至少，可以使得不同人群的情绪达到去极端化、去除暴力倾向的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舆论监督成为社会情绪的“负离子空气清新器”。在这一阶段进行舆论监督，能够有效缓解矛盾激化，促进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化；如果失去舆论监督的制衡，则会形成酝酿出更为危险的群体性社会行动事件。

（三）群体性事件即将触发时期——舆论监督的行动减压功能

一起平平常常的突发事件或者一例普通的维权诉求，如果最终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体性抗议、骚乱甚至暴动事件，那么，按照前面的理论分析，根本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完成整个诱发爆发过程的；因为从和平到暴力，从群体性事件连续统的低能级区域跃升至高能级区域，要经过反复的抗争互动和力量较量（可能要经过和平请愿和协商对话的正常渠道机制的尝试），并且至少要经过两次复杂的引爆过程。在群体性事件即将触发时期，有效的舆论监督可以延缓、消解掉“怨恨”群体的集体行动冲动，从而，起到“减压阀”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用在于报道利益群体的集体诉求，提供给政府相关决策、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机构的管理者以警示信息，敦促他们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减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当下在中国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在这一环节上，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往往是缺位的，常常表现在对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事实，在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压迫要求下，新闻媒体依然可以做到“集体噤声”、“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环境监视的媒体职责，放任事态向更坏更具潜在性暴力性突发性的方向发展。更有甚者，新闻媒体还有可能屈从于行政命令发表易于激活各种“次生怨恨”的解释（有的时候是谣言扮演了这一角色），则有可能使得群体性事件演变成一种现实行动，这样的舆论“导向”不仅不利于维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引爆事件的导火索。

可见，在这个时期，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会起到非常直接的效果，导致可能的暴力集群行为自行消解；相反，则其后果难以预料。新闻媒体在这个时期的作为或不作为，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两个截然相反方向的转化。这一时期是舆论监督的敏感期和临界期，舆论监督的实施，需果断，需谨慎，需把握好分寸。

（四）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舆论监督的政策纠偏功能

如果群体性事件已经爆发，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已经不能有效阻止其集体行动的行为，但还是可以对发生的事态进行总结反思，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和多方位的报道，对事态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和解释性报道，让公众参与发表看法，这样，在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的过程中，改进工作，纠正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政策偏差、错误或问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的功能尽管只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但是，对于后来者，依然具有“以儆效尤”的警示价值。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的舆论监督，事实上，需要媒介敦促整个社会做充分的反思，需要各方在公共话语空间做充分的质证、质询和答辩，才能把问题的信息充分暴露，让整个社会下次不会犯同类的错误。

当下在中国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在这一环节上，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依然是不充分的，新闻媒介在“集体噤声”后往往会忽然变得非常高调，而且高调批评的声音盖过了对问题真相的追问，群情激愤盖过了冷静思考，舆论监督过程在短时间内就草草落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简单的事实都还没有弄清楚，很少有机会让被批评者予以回应和辩驳，这样，群体性事件的根由往往被掩盖了，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秀，群体性事件存在的社会矛盾根由依然没有得到足够正视，相关的重要信息依然没有得到充分传播，潜在问题可能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舆论监督的政策纠偏功能，事实上应该渗透在各个时期，如果其效果能及早体现，就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了。

六、结语：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除以上分析所涉内容之外，需要补充的是在群体性突发事件酝酿、生成到爆发过程中，还有许多重

要因素不容忽视：谣言往往扮演着群体动员的角色，它使得行动者可能在短时间内信以为真，从而做出错误行动；群体中的积极分子或领导者，也可能对整个事件起到积极的推动、引领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操纵作用；此外，各种偶发因素和社会条件，群体的自组织行为、新媒体作用、人际沟通方式、社会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外来势力渗透干涉都可能在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都与本课题研究相关，但显然无法在一篇论文中都探讨清楚，这也从一个侧面足以说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复杂性，这些相关问题可以在未来的研究加以解决。理论分析容易，但在现实世界真正实行有效舆论监督其实并不容易，其缘由在于舆论监督在现实中会遭遇重重阻力和困扰^[11]，且舆论监督本身犹如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反受其害。只有在洞悉群体性事件内在动力机制的基础之上，看准时机，果敢实行舆论监督，才能真正起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科学发展的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之效。

（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在2010年8月乌鲁木齐召开的“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学术研讨会和同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九、第十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进行过宣读，在本刊发表时做了进一步修改，特此向提出反馈信息的专家和业内人士致谢！）

参考文献：

- [1] 于建嵘.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9(6): 114-120.
- [2] 刘能. 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 开放时代, 2004(4): 56-81.
- [3] Smelser, Neil J.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 [4] 王淦昌. 人造小太阳——受控惯性约束聚变[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26-87.
- [5]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 [6]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313.
- [7] 道格·麦克亚当, 西德尼·塔罗, 查尔斯·蒂利. 斗争的动力[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18-112.
- [8] 宋维强.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50.
- [9] 查尔斯·蒂利. 集体暴力的政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238.
- [10] 罗伯特·门斯切. 市场、群氓和暴乱: 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1-173.
- [11] 廖卫民. 当舆论监督遭遇危机公关——对“奶粉事件”食品安全危机传播的案例分析[A]. 第八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文集[C]. 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等编印, 2008: 507-511.